

Lessons from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De-Xing Guan (官德星,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系)

July 9, 2012

幾天前終於把 Ronald Coase 的最新著作讀完了, 本來想開始做自己的事, 但還是忍不住先把讀後心得寫下來再說, 一方面是藉此重新組織一下思緒, 再來也希望和有興趣但還沒讀過這本書的同學, 分享這位偉大經濟學家的最新想法。本文只是一個簡單的介紹, 並穿插我的意見做為同學們的參考, 當然, 直接閱讀原著永遠是完整了解作者思想的唯一方式!¹

芝加哥 (2008): 關懷中國的百歲老人

2008/07/14 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因為那天在芝加哥大學舉辦了一個中國經濟研討會, 召開會議的是一個年近百歲的老人, 此人不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芝加哥大學教授, 更被許多人認為是自 Adam Smith 之後對經濟制度了解最深入的人。這個老人自掏腰包, 拿出了他幾乎全部的諾貝爾獎金招待來自美國和中國的學者, 官員, 企業負責人, 而為期五天的研討會只為了探究一個問題的答案: 為何中國最後終於進入了資本主義?²

其實早在 1776 年 Smith 就問過類似的問題了, 他認為從馬可波羅 (Marco Polo) 1275 年造訪中國, 到國富論成書這五百多年, 中國的經濟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約束, 基本上是處於停滯狀態, 而此約束之所以產生, 是因為這段期間中國忽

¹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這本書最便宜的購買方式是直接跟英國著名的經濟事務學社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IEA) 購買 (<http://www.iea.org.uk/publications/co-published-books/how-china-became-capitalist>), 因為這本書是 IEA 和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共同出版的, 而後者的定價是前者的三倍。

² 我是台灣唯一參加這個研討會的人, 14 日一早開會前親眼見到 Coase 並和他簡短寒暄的感覺, 至今難忘! 有趣的是我本來是跟產權經濟學四個提出者之一的 Harold Demsetz 教授 (另外三人是 Coase, Armen Alchian, 和張五常) 夫婦在聊天, Coase 進場看到 Demsetz 後, 便命外傭將輪椅推了過來, 這時我夾在二老中間, 意識到是難得的機會可以聽到他們對話, 但沒想到 Demsetz 說他已經十幾年沒見到 Coase 後, 第二句話便說: “我還是不同意你的廠商理論”, 於是便滔滔不絕講了起來! 芝大的學術氣氛我在該校經濟系做訪問學者時是親身經歷過的, 但兩個十幾年不見的老朋友竟然見面第二句話就開始討論經濟學, 若不是親眼目睹, 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略甚至鄙視對外貿易，亦即鎖國造成市場萎縮，於是經濟停滯不前。³ 然而中國為什麼會忽視對外商業往來進而鎖國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討論，不過已經有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同學們可以自行涉獵。⁴ 總之，中國自十三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末這七百多年，經濟一直處於停滯狀態，而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前三十年，尤其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段期間，中國的經濟狀況更是落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在跌到深不見底的谷底之後，中國卻在過去的三十年開始脫胎換骨，快速成長，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這個被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稱為“五百年來難得的奇遇”的偉大故事是如何產生的呢？⁵ 這便是 Coase 和他的合著者王寧教授在書中想要回答的問題，而答案則要從三十多年前的一場會議開始說起。

北京 (1978): 實事求是的小平同志

時間回到 1978/12/22，為期五天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當天在北京閉幕，會後公報 (*communiqué*) 承認毛澤東所謂社會主義的最大缺點是中央過度集權，但卻提出了一個和毛澤東截然不同的處理方法：將某些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而國家發展的首要任務是提高農業生產力，因為這是整體經濟中最弱的一環。⁶ 這個公報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重要，但卻是整個中國經濟起死回生的

³ 譬如在國富論中 Smith 說：“China has been long one of the richest...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seems, however, to have been long stationary. Marco Polo, who visited it more than five hundred years ago, describes its cultivation, industry, and populousness, almost in the same terms in which they are described by travellers in the present times.” (Bk. I, Ch. VIII)，他接著在下一章又說：“China seems to have been long stationary, and had probably long ago acquired that full complement of rich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ature of its laws and institutions... A country which neglects or despises foreign commerce...cannot transact the same quantity of business which it might do with different laws and institutions.” (Bk. I, Ch. IX)

⁴ 譬如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聯經，1991，或是 Niall Ferguson，文明，聯經，2012，都是關於這個問題很好的參考書。此外，探討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改革的書也陸續出籠，譬如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這就是他在 2008 年芝大中國研討會報告的論文），趙紫陽，國家的囚徒，時報文化，2009，以及張維迎，中國市場的邏輯，木馬文化，2011，這三本書也都非常值得參考，尤其是前兩本。

⁵ 作為一個經濟學的愛好者，我常覺得非常幸運，因為我目睹了許多百年，甚至是幾百年難得一見的事情在眼前發生，譬如誰會想到二十多年前還不可一世的日本，竟然會失落了這麼久，威風已難再現？誰會想到共產主義會整個坍塌，前蘇聯竟然迅速解體？誰會想到美國會發生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重創了他世界霸主的地位？誰會想到歐洲竟然被債務纏身，歐元幾近解體？但最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中國竟然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站起來了，不但逐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些歷史事件都在過去二十多年發生，我只能用恭逢其盛，不可思議來形容了！

⁶ 毛澤東死於 1976/09/09，此後兩年多歷經四人幫和華國鋒的掌權，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確定鄧小平的執政地位，而鄧小平和他提拔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正是中國經濟改革前半段最重要的幾個人物，後期最重要的改革工作是由朱鎔基完成的，這些我們稍後都會說明。毛澤東雖然知道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多，是不可能憑他一人意志來掌管的，所以他想減少中央集權，但這個獨裁者畢竟不是真的想要大權旁落，所以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將權力下放，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重要轉戾點，原因無它，因為自此之後權利重新界定，許多經濟發展制度面和心理面的障礙逐漸鬆動，最終使得市場經濟得以重新開始運作，導致生產大幅和快速的提升。當然，上過我的課的同學應該常聽我提到寇斯定理 (*Coase Theorem*) 這個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前提的理論，⁷ 而這正是用來解釋中國經濟改革最適當的分析工具，我們在後面還會再仔細說明。

同學們千萬不要誤以為中國的改革是在這個會議中透過由上而下 (*top down*) 的方式完成的，恰恰相反，這個會議的結論其實是因應中國當時不得不改變的氛圍而形成的，這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犧牲幾千萬人命的慘痛代價換來的改革，如果不是毛澤東和他所信奉的共產主義被殘酷的事實徹底否決，中國的改革是不可能發生的；中國的改革是標準的由下而上 (*bottom up*) 產生的，也就是由基層的農民，企業，和地方幹部為了自己的生存自動自發產生的革命，透過這些自發性的改革使中央了解該將哪些權力下放，並逐步減少政府干預，如果中國政府在這改革中有任何貢獻，那麼必然是在鬆綁和解除管制等方面所做的努力，這些措施降低了使用市場的成本，於是幫助了價格機制的建立與順利運作。Coase 在文中反覆強調由下而上的基層人民自發性行為，才是中國經濟改革最重要的原動力，而不是像許多學者或媒體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能力或效率，或許中共唯一的貢獻是在“實事求是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這個態度上，尤其是鄧小平和提出“鳥籠經濟”概念的陳雲都有這樣的傾向，在實事求是的氛圍下，於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Practice is the only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這樣的概念才能蔚為主流，也才能使中國脫離一些社會主義的教條，逐步向資本主義靠近。⁸ 有了精神上的解放作為基礎，那麼中國經濟改革中最需要的制度變遷從何而來呢？答案是來自千千萬萬為了求生存的老百姓，他們冒著極大的風險所做出的些微變革，卻在不經意中改變了整個中國，使中國經過數百年的掙扎，最後終於逐漸地走向了資本主義！

⁷ 這個定理最早出現在 Ronald Coas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59, 原文是：“...the delimit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 (p. 27), 因為文章在初審時被評審退稿，後來在主編 Aaron Director (Milton Friedman 的大舅子) 的“偏愛”下得以刊登，但交換條件是必須到芝大接受群雄質詢，於是接著就發生了 1960 年初 Coase 單刀赴會，舌戰芝大群儒的故事，細節請參考群儒之一的 198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George Stigler 的回憶錄: *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Ch. 5, 大辯論後, Coase 擊敗芝大諸雄 (包括 Friedman 和 Stigler), 於是將結果擴展成一個一般理論，也就是他最有名的論文: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⁸ 陳雲和鄧小平其實都是中共政權堅決的支持者，這從鄧小平在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採取強硬立場，並軟禁趙紫陽都可以看出，而陳雲比鄧小平更信奉社會主義，他的“計畫為主，市場為輔”的鳥籠經濟思想 (市場像鳥，社會規劃是籠子，資本主義必須在社會主義的約束下成長，因為捏緊了鳥會死，放鬆了又亂飛)，曾經主宰了 1980 年代初期的中國經濟改革，但後來在許多基層自發性的制度變遷出現後，陳雲的想法就漸漸被揚棄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篇在 1978 年經胡耀邦同意刊登在黨內雜誌的文章，它反應了中共想要擺脫毛澤東獨尊馬列思想的極端性，所以這篇文章在中國廣泛流傳代表了中共精神上的部份解放，雖然他們還是認為資本主義不好，但是已經打算修正社會主義的缺失，只是後來在修正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卻不知不覺地向資本主義靠近，這也是 Coase 所說中國經濟改革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而帶動精神改革的胡耀邦在 1989 年初去世，這也間接導致緊接而來的天安門學生示威事件。

來自經濟邊陲地帶的革命

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兩個核心概念就是中央政府規劃 (*central planning*) 和產權集體擁有 (*collective ownership*)，在中央政府缺乏足夠資訊的現實條件約束下，中央規劃早已被多數經濟學家發現是行不通的，⁹ 然而產權集體擁有或是共產的錯誤，卻必須從產權經濟學著手才能看出，而共產中國的經濟落後主要是和第二個因素有關。¹⁰ 中國經濟能夠起死回生正是因為主要位於農村的經濟邊陲地帶在 1970 年代末期開始，自發性地創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制度，使產權得以重新界定，¹¹ 因而激發出農民的生產力，使產出大幅上升，而這些成功的案例給了中共一點放手的信心，於是在中央默許的情形下，才逐漸在全國推展開來，中國後來所有的改革幾乎都是沿襲這個模式。所以 Coase 的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前提的理論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起了大用，當然，這不是說農民是因為知道這個理論，才想出活命的方法，正好相反，農民根本不知道有 Coase 這號人物，更不知道什麼寇斯定理！理論影響的是執政者，尤其是他們對於經濟體系運作原理的想法和態度，這使得他們後來愈來愈能接受要將權利界定清楚，經濟才能發展的概念，從這一點而言，Coase 對中國經濟能起死回生應該是要記上一筆功勞的。¹²

那麼究竟有哪些來自經濟邊陲地帶的革命 (*marginal revolutions*) 呢？Coase 認為主要有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鄉鎮企業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私營經濟或個體戶 (*individual economy*)，經濟特區 (*special economic zone*)。¹³ 這四個邊陲革命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決定

⁹ 海耶克寫過一系列的文章來反對社會主義，他最後一本書的副標題就是社會主義的謬誤，Coase 在書中提到海耶克多次，可見他對海耶克想法的重視。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參考：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這是他最負盛名的著作，或是他最後的著作：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¹⁰ 這不是說中國沒有中央規劃（譬如到現在還有五年計畫），然而中共的體制和前蘇聯是不一樣的，後者遵行列寧 (Vladimir Lenin) 的想法，將國家視為一個超大的公司來經營，因此所有生產和消費的細節都由中央政府規劃產生，而中國則自毛澤東開始就走不同的路，從未打算仿效前蘇聯的方式來經營國家，但毛澤東的作法比較像古時候中國的皇帝，他是透過一些自己選派的官僚來遂行他的個人意志。由於他死抱著錯誤的馬克思理論，實行人民公社 (*commune*) 制度，廢除私產，終於搞到人民一窮二白，禍國殃民莫此為甚！

¹¹ 經濟學中的財產權主要有四種：所有權 (*ownership, or right to exclude*)，使用權 (*right to use*)，收入處分權 (*right to derive income from the use of*)，以及轉讓權 (*right to transfer*)，細節請參考：Steven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 115-117 (這是張五常 UCLA 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或是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8。

¹² 將 Coase 的思想傳遞到中國主要是張五常的貢獻，他在 1980 年代初期被 Coase 敦促回香港大學任職，並開始用中文寫下許多探討中國經濟的文章，主要集結在 中國的前途 和 再論中國 這兩本書中 (分別於 1985 和 1986 年在香港出版，台灣版在 1989 年由遠流出版)，這些書曾被中共高層廣泛閱讀，而趙紫陽 1988 年在北京和 Friedman 會談時一再提到產權界定的重要性 (<http://web.ntpu.edu.tw/~guan/courses/Friedman-Zhao.pdf>)，很可能是受了張五常這兩本書的影響。

¹³ 詳情請參閱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Ch. 3。

將部份權力下放後，才有可能發生的制度變遷，而這四個革命主要是使人民的生產誘因提升，但和真正市場機制的建立還有一大段距離，後者必須透過所謂的價格雙軌制 (*dual-track system*) 的運行，以及接踵而來的 1992 年的價格改革 (*price reform*) 和 1994 年的稅制改革 (*tax reform*)，才能逐步完成，這些都會在下一節再加以討論，本節只對四個邊陲革命做簡要的說明。

在這四個邊陲革命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可能是最重要的，不僅是因為它最早發生，而且也因為它的影響最深遠。這個制度不是任何人設計出來的，而是由一些飢餓的農民為了活下去被逼出來的結果。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毛澤東在全國推動人民公社制度，農民的勞動所得全部歸公，再由公社幹部集體分配，而因為無法完全保障自己的工作所得，因此農民的生產意願低落，得過且過。公社幹部見農民偷懶，於是將人民分成幾個生產大隊，每個大隊分別派人監管，或安插抓耙子互相監視，但效果十分有限，公社幹部只好再將生產大隊細分成生產小隊，每個小隊分別派人監管，但仍無法激起農民工作意願，因為農民都已在饑餓邊緣，處不處罰已無多大差別。在這當下，1978/11/24 那天晚上，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有十八戶農民在村長家簽了一份協議書，大家同意將上繳生產隊之外多生產的部份留為己用，即所謂的“包產到戶”，¹⁴ 但因為這是違法的行為，因此若是被抓到而坐牢，那麼沒被抓到的人必須負責撫養被抓的人的小孩到十八歲。¹⁵ 這個冒著極大風險的協議後來還是曝光，但在鄧小平默許下，這些違規農民並沒有受到處罰，而鄧小平默許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小崗村的產出因生產誘因增加而急升，而這正是中央所樂見的，因此小崗村的包產到戶模式在 1982 年之後便逐漸在全國普及，愚不可及的人民公社制度終於化為歷史的灰燼！

如前所述，十一屆三中全會下放了一些權力給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但中共當局對私營企業還是抱著敵對的態度，於是一些地方政府便仿效農業的包產到戶方式，在地方上默許人民（也包括地方幹部）以公營企業的名義經營鄉鎮企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好處是可以抽稅，而地方政府甚至還可以得到額外的利潤，所以都沒有阻止。而個體戶也在同時出現，尤其是在以手工業聞名的浙江省溫州市，產生了一批批著名的溫州商人。於是這些鄉鎮企業和個體戶便成了未來中

¹⁴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生產是以公社或後來的生產大隊或小隊為單位，而包產到戶或比較正式說法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以家戶為生產單位，家戶就包辦了所有規劃，經營，分配等工作，但須達到政府規定的產量繳庫，剩下的可以自由分配，這等於政府將財產權中除了所有權（土地仍是國有）之外的使用權，轉讓權（主地雖然還是不能轉讓，但可以透過轉租的方式處理，亦即合約是可以轉讓的），和收入處分權，由人民公社或生產隊下放給家戶負責，權責相符之下，生產誘因自然激增。有關產權的分類請參考註 11 的說明。

¹⁵ 中共官方說法是小崗村的秘密集會發生在 1978 年 12 月，日期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機密的會議，所以許多會議細節都沒有紀錄，而當事人也不願多談。此外，中國農民最早的自發性改革運動是發生在 1976 年 9 月，當時四川省蓬溪縣九龍坡村就已經開始實行包產到戶，比四川省全面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早了四年多，也比小崗村早了兩年多，但無論多早，這些改革都是毛澤東在 1976/09/09 死了之後才有可能發生，由此可見中國受毛澤東錯誤思想的箝制有多大。小崗村的故事因為列入教科書，被當作樣板來宣傳，因此比較有名。

國製造業甚至世界工廠的搖籃，儘管他們在政治和法律上要等到 1992 年才被正式承認！而 1992 年為什麼如此重要，是因為當年年初鄧小平南巡，宣示要繼續改革開放，不受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影響而走回頭路，中國經改方向再次確立，再加上 1992 年的價格改革使價格雙軌制的負面效果降低，於是在這種氛圍下，私營企業的合法性就不再是個禁忌話題了。

在毛澤東死後到鄧小平重新掌權這兩年多，中國主要的領導人是華國鋒，他和毛澤東最大的不同是他認為中國應該對外開放，不應閉關自守，但同學們不要誤以為華國鋒是想要在經濟上完全自由開放，他其實只是想找一些地方試點開放，先看看成效如何再說。1977 年底鄧小平去廣東深圳巡視，發現有許多老百姓因為非法越過邊界跑到香港工作，被當地政府遣返，由於越界人數太多，造成管理上的極大困擾。隔年四月中共在北京召開會議尋求解決之道，席間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提議利用廣東鄰近香港的地利之便，增加對外的經濟和技術的交流。¹⁶ 這個提議獲得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支持，但黨內仍有許多保守勢力抗拒，所以又過了一年，國務院才在 1979/07/15 通過成立經濟特區，1980/08/26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通過，當天也就成了深圳經濟特區的誕生日。¹⁷ 三十多年後深圳已由一個貧窮的小漁村，蛻變成人口超過千萬的大都市，制度變遷所帶來的經濟效應，真是令人無法想像！¹⁸

市場的運作需要成本

有了以上四個邊陲革命，中國就此步上坦途了嗎？當然沒有，理由有三，一是儘管邊陲革命提升了一般民眾的生產誘因，但生產要素市場（包括勞動，資本，土地等）仍未正常運作，譬如受戶籍法約束，人民居住和就學就業的選擇仍不能完全自由，而資本市場的管制仍然太多，雖然上海證交所在 1990/12/19 恢復運作，而深圳證交所也在 1991/07/03 開幕，但中國對於資金的移動，企業貸款的取得，以及外匯市場的管制仍然十分嚴格；此外，土地使用權的更動仍不方便，

¹⁶ 即將接替胡錦濤出任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就是習仲勛的兒子。

¹⁷ 和深圳同時成為經濟特區的還有廣東的珠海和汕頭，以及福建的廈門，後來陸續成立的還有 1988 年海南島，1992 年上海浦東新區，2006 年天津濱海新區，以及 2010 年的新疆喀什。

¹⁸ 內生經濟成長理論提出者，著名經濟學家 Paul Romer 最近也一直鼓吹落後國家成立特許城市 (*chartered city*)，以吸引國外的資金，人才，和創意來刺激經濟成長，這和中國當年成立經濟特區的想法是類似的。然而 Romer 忽略的是，看起來這件事好像可以透過政府由上而下的方式執行，但若如此，這世界將再無貧窮，除非政府不做！但我們從中國的經驗發現，如果不是許多底層人民活不下去，用腳投票，拼死逃到香港追求新生活，中國政府也不會想到開放，而同時若是政府中沒有像鄧小平這種願意嘗試，相對開明的掌權者，同意試一試，經濟特區也不可能行得通！所以由下而上的力量必須夠強大，而且執政者有開放心胸不阻擋，樂觀其成，這兩個因素必須同時成立，權利才能重新界定，重大制度的改變才有可能發生！脫貧不是像想像中那麼容易的，有許多心態和技術上的因素都必須一一克服。

而增值稅 (*value-added tax*) 可能導致的地方性債務累積, 也在最近逐漸成為一個不可小覷的問題, 我們會在稍後討論。¹⁹

其次, 雖然有包產到戶, 鄉鎮企業, 和個體戶等新的經濟制度出現, 但是國營企業仍然掌握了最多的資源和最重要的產業, 譬如主要的銀行, 能源, 重工業, 甚至大學等, 幾乎都是國營或是官股為主, 這使得私人的企業家精神還是只能停留在相對弱勢的產業, 無法完全帶動整個中國的企業文化, 到一個比較由市場決定的競爭水準, 而在 2009 年金融海嘯後, 由於四兆人民幣下鄉計畫多半是經由國營企業運作, 因此“國進民退”的說法開始甚囂塵上! 所以國營企業的比重應該還要再降低一些, 對於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會比較有助益。

最後, 由於早期陳雲的“計畫為主, 市場為輔”思想的影響, 以及後來中共一直保有龐大的國營企業, 因此價格雙軌制便逐漸形成。雙軌的意思是說: “計畫內的產品按照政府定的價格交易, 計畫外的產品按照市場價格交易”,²⁰ 在雙軌制之下, 市場價格自然無法反應真實的資源使用成本, 因為只有一小部分產量是在市價下交易的, 因此中國必須要經過一段摸索期, 才能逐漸建立起市場機制。然而 Coase 認為價格雙軌制也有它的好處甚至是必要性, 此話怎說? 他舉了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共產國家 (譬如波蘭和捷克), 在 1990 年代初期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到資本主義所發生的一些問題為例, 當時這些國家幾乎都是用所謂的“休克療法 (*shock therapy*)”來建立市場, 也就是從無到有, 一次完成, 然而 Coase 認為市場不是一直存在於某處, 隨叫隨到, 像一個開關一樣, 一開就有! 市場的建立和運作都是需要成本的,²¹ 東歐一開始轉軌不順是因為市場運作需要的權利界定, 法規制定, 以及人民的交易習慣都還沒到位, 因此忽然一鬆綁, 市場是不會自動出現的, 買賣雙方都不進場或都在場外交易, 那麼市價要如何決定呢? 所以 Coase 認為中國的雙軌制給了市場運作一個緩衝期, 一方面讓人民慢慢習慣從計劃經濟切換到市場經濟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另外也讓政府有機會慢慢學習去建立法規和制度, 幫助市場正常運作。他說許多人都認為政府應該先建立好遊戲規則, 然後市場才能開始運作, 但其實政府和一般大眾一樣並不熟悉市場是如何運作, 因此在資訊不足下, 政府也無法先制定好法規, 因為它也不知道什麼該限制或不該限制, 由於有這些資訊不足的成本, 所以市場的建立和運作是一個集體的學習過程, 雙軌制雖然有它的缺點, 但由於市場的建立和運作無法一步到位, 因此雙軌制給了市場運作一個緩衝期, 降低了市場運作的成本。

¹⁹ 譬如小崗村村長幾年前在胡錦濤巡視當地時曾當面請求變更土地使用權, 希望能將原來種葡萄的農地變更為商業用地, 因為他想把地租給商人做賣場, 但最終仍未得到許可。

²⁰ 參見張維迎, 中國市場的邏輯, p. 206。

²¹ 這就是 Coase 所提出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 這包括了搜尋資訊, 協商議價, 和執行法律 (譬如履行合約) 等三項成本, 而 Yoram Barzel 在 1982 年又加入了第四項的度量成本。關於前三項交易成本, 請參見: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1937。

價格與稅制改革

中國的經改在天安門事件後發生了嚴重的阻礙，黨內保守派像是李鵬等人對開放的方向和幅度起了懷疑，同時他們也擔心學生運動和市場經濟會威脅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而即使是鄧小平本人也曾有所猶豫。²² 而加深這些疑慮的是 1985-1988 年的通貨膨脹，這個持續數年的物價上漲，差點摧毀了改革派對市場的信心，只不過通膨其實是價格雙軌制這個價格管制措施的必然結果，所以通膨一旦被控制也就代表價格雙軌制已經走到了盡頭，這就是我們即將要討論的 1992 年的價格改革所帶來的結果。

1985-1988 的通膨是借貸和勞動市場價格雙軌制的結果。1978 年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一家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後，從 1979 到 1984 年先後分設或新成立了中國目前的四大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以及中國工商銀行，而在四大國有銀行成立後，中國人民銀行也在 1984/01/01 改制為中央銀行。由於四大銀行的貸款額度是由央行決定的，²³ 而中國人民銀行在 1984 年第四季宣佈，四大銀行下一年度的貸款額度以今年的實際貸款金額為準，這使得四大銀行利用剩下的幾個月拼命放款，以爭取明年有較大的貸款額度，於是超貸濫貸嚴重，種下通膨的因子。但壓死駱駝的最後那根稻草，是勞動部在 1984 年同樣規定下一年度的工資調漲以今年的實際工資為準，²⁴ 於是國營企業拼命向銀行借錢來加薪，由於當時銀行和企業都是以國營為主，沒有足夠的民營銀行和企業可以和它們競爭，因此在市場價格機制無法發揮功效下，通膨就產生了。從 1985 年開始，物價便一直上漲，1988 年通膨率甚至達到兩位數。後來雖然嚴格限制銀行超貸，通膨得到控制，但這突顯了價格雙軌制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也就是說由計畫內（中央或國營企業）決定價格的比例要降低，而由計畫外（市場或民營企業）決定價格的比例則要提高。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經濟局勢穩定後，中國便開始了一連串的價格改革，包括穀物，鋼鐵，煤，原油，和其它許多商品的價格雙軌制都被取消。²⁵ 自此大多數商品的價格都可以由市場決定，但如前所述，生產要素的價格仍然是以中央規劃或國營企業決定為主，因此中國的價格改革在生產要素價格這部份（包括工資，利率，地租，以及其它資產價格），還有一段長路要走。²⁶

²² 鄧小平儘管主張改革開放，但他在政治上是很保守的，我相信他應該至死都信奉社會主義，他的所作所為只是想修正或拯救社會主義，應該從來沒有真心想要擁抱資本主義，而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這方面是比他開明一些的，但好在鄧小平在 1992 年南巡後還是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否則中國是否還能繼續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不是重回社會主義路線，還是未定之數。

²³ 改制後農行，中行，和建行從人民銀行中分設出來，形成雙軌，但人行仍然負責決定四大銀行的貸款額度。工商銀行是 1984/01/01 新成立的銀行，而建行在 1996 改名為中國建設銀行。

²⁴ 勞動部已在 1998 年 3 月改名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²⁵ 細節請參考：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p. 124。

²⁶ 社會主義在理論上生產要素是公有，因此要政府放棄要素價格管制比放棄商品價格管制難。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地方政府得到比較多的權力，鄉鎮企業和個體戶的興起也使地方經濟能力增加，而中央政府釋出權力換來的是稅收，因此算是一個雙贏的局面。²⁷ 然而這中間仍然暗藏玄機，因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貢獻，但兩者要如何分享稅收就成了一個大問題，這分成問題也導致市場決定價格的成本上升，因為各個地方政府和中央拆帳的方式都不一樣，因此產生極大的協商議價成本，而因為各縣市會互相競爭比價，這使得價格產生很大的紛歧，因而導致資訊成本提升，這種種因素都使得市價難以決定，造成價格改革的另一個障礙。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必須從稅制改革著手，而處理這個棘手問題的人正是中國經改第二階段最重要的人物：朱鎔基。他在 1990 年代一連串的改革，才終於大致解決了 1980 年代末期因通膨和學生運動所帶來的紛擾，也使得鄧小平拍板定案的改革開放路線得以延續。他最重要的幾項措施包括 1993 年自任央行行長，嚴格審查違法超貸，以控制物價，接著在 1994/01/01 宣佈對企業課徵全國單一稅率 17% 的增值稅，其中 3/4 歸中央，1/4 歸地方政府，這等於一次解決了各地稅制和稅率不一的亂象，因此 1994 年這個稅制改革使 1992 年開始的價格改革更趨完善。²⁸ 然後在 1995 年 1 月朱鎔基將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固定在一美元兌 8.277 人民幣的水準，對穩定物價和帶動出口成長幫助甚大。當然，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從 1980 年代的珠江三角洲，逐漸轉移到 1990 年代以後的長江三角洲，在這過程中朱鎔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國應開放言論和思想市場

在 1974 年 Coase 寫了一篇比較沒那麼有名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在探討言論或思想市場 (*market for ideas*) 和一般的商品市場究竟有何不同?²⁹ 答案很簡單：沒什麼不同！當然這是有點過度簡化的解釋，但 Coase 的意思是說言論自由不能無限上綱，有毒言論和有毒商品一樣都是要管制的。而同樣的理論以中國為例，我們可以這樣來看：思想的正確性也不能無限上綱，沒有什麼想法是一定對，不容許討論的，所有的思想，言論，創意，就和一般商品一樣，都應該拿到市場上接受消費者的檢驗和同業的競爭，Coase 認為中國應該儘快開放它的言論和思想市場，因為思想，言論，創意等不僅是知識經濟中最重要生產要素，更

²⁷ 這和 Smith 描述西方城市 and 自由市民 (*free burgher*) 興起的過程類似，當時農民向國王納稅以脫離封建地主，換取自由市民的身分在城市中營生，細節請參考國富論 (Bk. III, Ch. III)。

²⁸ 有關 17% 增值稅的廣泛影響，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中有詳盡的說明。不過在這個稅制改革後，由於地方政府只拿到 1/4 的稅金，一開始地方政府的稅收還因經濟成長而增加，但隨著各地方政府招商的競爭愈來愈激烈，稅收便日益捉襟見肘，這也是目前中國地方性債務日益增加的原因之一。

²⁹ 請參考：Ronald Coase, "The Market for Goods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http://web.ntpu.edu.tw/~guan/courses/Coase74.pdf>)。

是人類社會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支柱。有趣的是, Coase 在書中提到中國總理溫家寶幾次, 這是因為溫家寶說他最喜歡看的書是 Smith 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 而這也正是 Coase 常常掛在口邊的兩本書。³⁰

Coase 也用同樣的推理認為資本主義會有不同的形式, 它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有不同的樣貌, 沒有最好的形式或是模型可以複製, 而資本主義可以和民主結合, 也可以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結合, 西方式的民主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 也不是一個一定值得去追求的目標, 只是中國如果繼續限制人民的言論和思想自由, 那麼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局限, 因為中國政府沒有接受不同意見的雅量, 當意見或想法不能在市場上自由交流時, 言論便會定於一尊, 而思想和創意就會被抹煞, 物質和精神文明便會同時萎縮和倒退了! 所以中國不但要開放思想市場, 更應該從中國古老文明中尋求智慧, 譬如 Coase 就提到孔子和孟子多次, 也提到商鞅重視法治, 又提到老子和朱熹等人的思想。

總之, Coase 是要提醒中國不要忘了它文化的根, 因為在毛澤東批孔揚秦, 打倒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下, 中國曾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失去信心, Coase 認為這是錯誤的, 他認為中國傳統重視道德, 仁愛, 和推己及人的思想正是資本主義運作不可缺少的元素, 而這正好和 Smith 的觀點相呼應, 因為道德情操論可以說是國富論的前傳, 前者討論人類精神文明要如何追求, 後者討論人類物質文明要如何發展, 前者仰仗的是同理心 (*sympathy*),³¹ 而後者依賴的是自利心 (*self-interest*), 兩本書的觀點互為表裡, 互相依存, 也互相補充: 若多數的人過於自私, 沒有同理心, 那麼大家防來防去, 互相猜忌, 市場運作成本太高; 但若多數人都只想到別人, 那麼市場很難擴大, 物質文明無從發展, 固然在物質缺乏的環境精神仍可滿足, 但總不如精神物質同樣富足來的快樂! Coase 認為只要中國政府願意敞開心胸, 擁抱不同意見, 也能在思想市場上發揮實事求是的精神, 讓人民的思想可以自由開放地表達和交換, 那麼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將是無可限量的!

台北 (2012): 政府失敗導致市場失靈

場景最後回到現在的台北, 炎熱的天氣和苦悶的政治新聞都令人覺得煩燥。

³⁰ 關於溫家寶的說法以及 Coase 的回應, 請參考: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pp. 184-188, 此外, Coase 也寫過兩篇評論 Smith 這兩本書的文章, 請參考: Ronald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³¹ 或許有人會認為應該翻成同情心, 因為同理心是“empathy”這個字的中譯, 但是從我個人讀道德情操論的心得來說, 我覺得 Smith 所謂的“sympathy”比較接近同理心, 而不是一般直譯的同情心, 所以在本文中我還是用了同理心這個名詞。

手中翻著 Coase 的書，不禁讓我思索前述中國的歷史，究竟給了我們什麼啟示？腦中浮現的第一個答案就是政府的能力和效率！中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政府錯誤的政策可以引起的災難是無法想像的，毛澤東的固執和極權直接或間接造成了幾千萬人民失去性命，活活餓死，而錯誤的經濟理論所造成的災難也同樣可怕，馬克斯和恩格斯認為私有財產是所有社會不公不義的根源，於是一句廢除私產喊得震天價響，³²也震碎了無數無辜人民的心，而野心政客加上糊塗學者的組合所造成的災難，我想就不必再多說了！

台灣最近的新聞又被貪腐事件淹沒，不管藍綠都有人貪污！而政府究竟在做什麼呢？中國貪污一樣嚴重，但就像張五常所說，中國政府一定還是做對了什麼，才能在三十年內使中國由黑翻紅，³³而同樣的道理，台灣最近二十年的各黨政府也一定做錯了什麼，才使台灣的經濟泥足深陷，停滯不前。那麼台灣近二十年各黨政府究竟做錯了什麼呢？我想可能有下面幾個吧，而我相信每個台灣人都可以列出一堆比我更多更清楚的項目：首先是藍綠的對立，這種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態度，在台灣已經蔓延太久，造成極大的市場運作成本，但中毒已深，難以根治。其次應該是司法不獨立也沒威信，台灣固然法治 (*rule of law*) 談不上，就連依法而治 (*rule by law*) 都有問題。³⁴再來應該就是政府只顧選舉，不會治國，許多過時的法律不去修正，做事情時又瞻前顧後，深怕選票流失，這些都會提高市場運作的成本，使經濟停滯不前。

還有許多問題，我想同學們集眾人之力一定可以想到更多。我常想一個國家要“由儉入奢”是多麼困難（譬如近三十年的中國），但要“由奢返儉”卻又如此容易（譬如近二十年的台灣），³⁵就覺得治國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比經濟學要複雜太多了，然而從中國近三十年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政府一定要不停地改革開放才能醞釀一個好的環境，使人們的創意和才能得以自由公平地發揮，這中間必定有許多阻力，譬如貪污，政黨鬥爭，或是意識形態的糾結，這些幾乎都無可避免，然而若是努力生活的人民和堅定信念的政府，二者能緊密結合，就必定可以度過任何難關。事在人為，換個角度，轉個心念，會有一番新氣象！

³² 譬如他們兩位在共產黨宣言這本著名的小冊子中說：“...the theory of the Communists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single sentenc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請參見：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 Sec. II.

³³ 參見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p. 117。

³⁴ 試想一場球賽若規則訂得不合理，那必然會引起混亂，這是法治出了問題，應該修法解決，而若不論規則合不合理，但裁判亂吹，不依規則吹判，那就是沒有依法而治了，此時應該更換裁判，前者是立法問題，後者是司法和行政的問題，而台灣顯然這兩個都出了問題。

³⁵ 容我在此處將儉想成窮，奢想成富，這當然跟司馬光訓儉示康一文中“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的語意有些出入，但希望無傷大雅！